

一件花插背后的中式美学

台传媒记者元萌/文 杨辉/摄

吴自牧在《梦粱录》中有云，“焚香点茶，挂画插花，四般闲事，不适宜家”。作为古代文人雅士的“生活四艺”之一，插花这门艺术，在现代看来，也似乎不算陌生。

插花，自然离不开花器。这件明龙泉窑青釉露胎方形瓷花插，1996年7月底在温岭潘郎陶家埠西山村出土，现藏于温岭市博物馆。曾经的它，是文人案头赏玩的清供之物，诉说着幽栖闲居时的赏心乐事。透过方寸之间的造物，仿佛一秒进入明代文人的生活起居。

在龙泉窑青釉瓷器中，这件花插是相当特别的存在。

露胎釉工艺所形成的“撞色”，成就了这件瓷器的独特之处。与一般的青瓷不同，花插四周镂空的图案没有施釉，而是直接露出了胎体。由于胎体中含有一定比例的紫金土，烧成后呈现出明显的火石红。

瓷器不施釉或挂釉不到的部分烧制后会露出胎骨，露出面积较大，称为“露胎”，露出面积较小，则称为“缩釉”。

露胎釉工艺，从元代开始流行。在学界普遍认可的说法中，露胎起初是叠烧时无意间形成的，而后才成为一种装饰。窑工将器物的内底中心和底座部分都除去釉，露出胎体，并用垫饼支撑，一个叠一个装窑烧成，这样的垫烧方式大大提高了青瓷的产量，不足之处就是会导致器物局部未上釉的情况出现。

未上釉部分，烧成后呈朱红色，与器物表面温润的青釉对比强烈，相映生辉。长期以来，龙泉青瓷以纯净的青釉为佳品，釉面出现缩釉露胎或铁点的瓷器均被视为瑕疵品。当年龙泉窑的窑工，无心插柳成荫，反而让这些“瑕疵”成了别具匠心的装饰。

细细端详这件花插，整器由器身和底座

组成，通体相接，连座制式，高20.5厘米、口径8.5厘米、底径8.5厘米。其身外壁斜直，自上至下分三层。上层与底层镂空装饰缠枝花卉；中部以模印、刻划、镂雕等手法刻画荷花、莲叶、鸳鸯、水波纹饰，寓意“一路连科”；底座平沿外突，刻划回纹一周，下承八朵垂云纹，向外鼓起，与底座相接。

这件花插整体呈方形，这又是一个特别之处。瓷器行业中，素有“一方顶十圆”的说法，这是从制作工艺难度上来说的。因为像常见的瓷碗、瓷杯、瓷盘、瓷罐等圆形瓷器，主要通过陶车拉坯来实现。而方形瓷器的制作过程相对繁琐，得一块一块做好之后拼接起来。

古时文人折花入器，有了花的装点，花插才仿佛有了灵魂。

汪曾祺曾在散文中写到一幅古画，画中的老者手捧一只花瓶，瓶里插着梅花，正要放到几案上，画中还题有一句“山家除夕无他事，插了梅花便过年”。这幅古画便是典型的“清供图”。

“清供”又称“清玩”，由佛前供花发展而来，最早为香花蔬果，后来发展为包括金石、书画、古器、盆景在内，一切可供案头赏玩的文雅物品。这件龙泉窑瓷花插，应视为文人案前的清供花插。

生活在那个年代的文人雅士，延续宋代宋朝清供的传统，尤其热衷于退隐造园、宴饮享乐、清供赏器之雅趣。从一花、一叶、一瓶之中，他们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世界。

插花，也成为了一件正经事。明代文人无论是对于花材还是花器的选择，都很讲究。明代金润《瓶花谱》单列“花瓶”一节，认为花器“儒雅尚清素，故磁者为佳，择其模范古拙者方可用”。张谦德《瓶花谱》中，“贵磁铜，贱金银，尚清雅也”，可见当时瓷器成了花器的首选。

文人插花，也追求与所处环境的和谐。

他们追求素朴、雅致、自然之境，除了花与花器，天然几案、藤床、笔砚等均是不可或缺的物件。

明代文人尚雅，在袁宏道的《瓶史·清赏》中也可可见一斑。“茗赏者上也，谈赏者次也，酒赏者下也”，在他眼中品茶赏花最为风雅，而赏花时饮酒是一种忌讳。他也在书中写道，插花品赏是自己的兴趣所在，应当由爱花之人亲自完成，“取花如友”，便是如此。

这件花插，为何会流转到温岭，如今具体细节已无法考证，但可以确定它是一件产自明代龙泉窑的文物。

明初，龙泉窑和景德镇窑并驾齐驱，是当时全国制瓷业的两大中心，其中龙泉官窑归处州府管辖。据《明会典》记载，“洪武二十六年(1393)定，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，须要定夺制样，计算人工物料，如果数多，起取工匠赴京，置窑兴工，或数少，行移饶、处等府烧造”。

明正统七年(1442)，浙江爆发叶宗留、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。龙泉窑毗邻农民起义军的控制区域，于正统十三年(1448)遭农民起义军攻破，损失惨重。窑场遭到焚毁，当地窑工为躲避战火，逃往未受战乱影响的江西景德镇。

镇，也将龙泉窑的生产工艺带到了景德镇窑。此后，龙泉窑渐渐走向沉寂。

《龙泉县志》中，对龙泉窑瓷器虽有“化治以后，质粗色恶”的记载，但当时龙泉窑瓷器的外销需求依旧旺盛。

学者沈岳明在《从“龙泉天下”到“天下龙泉”》一文中指出，元代中晚期到明代早期的龙泉窑，在中国外销瓷中已经形成了“龙泉天下”的总体流布格局。他认为，“从伊斯兰地区对龙泉瓷器的模仿，14至15世纪东南亚地区仿龙泉的窑场和产品，17世纪日本有田瓷器对龙泉窑的模仿等现象来看，当时形成了‘天下龙泉’的大势，龙泉窑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影响”。

明代由于实行海禁政策，龙泉窑瓷器的生产和销售受到了很大影响。除了少量的朝贡贸易，不允许中外商人随便进行贸易。从窑址调查的情况看，明代只有130处左右窑场还在继续生产，特别是明中期以后，核心生产区也从龙泉大窑转移到了庆元竹口一带。

因此，当时龙泉窑也从产品输出转向了技术输出。以东南亚一带的越南、泰国为例，除了龙泉青瓷外，当地还出土了相当数量的仿烧龙泉青瓷，其产品从造型到烧制工艺，甚至包括细节处理，都与龙泉青瓷别无二致。

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，在龙泉大窑枫洞岩遗址的考古发掘中，出土了一批明代青瓷精品，颠覆了此前学界“龙泉窑到明代已经衰落”的观点。如今，岁月不改其华的龙泉青瓷，向后人讲述着它优雅的“前世”。

(参考文献:《从“龙泉天下”到“天下龙泉”》沈岳明、《传统龙泉青瓷露胎装饰研究》周莉、《中国插花简史》孙可 李响)



两尊石翁仲，“守护”南宋文官硬汉



石像手部细节



石像铠甲上的鳞片

台传媒记者林立/文 杨辉/摄

任何人跨入三门县博物馆的门槛，都猜不到屏风墙的背面，有两尊3米高的武将石像。

这两尊武将石像有统一名称——翁仲，是古时帝王将相陵墓前石刻仪仗队的其中一组。

三门县博物馆这两尊翁仲，守护的是一位文官中的硬汉——南宋丞相叶梦鼎。

荣耀象征

翁仲本非石人像的专称，而是秦始皇手下一员猛将的名字，叫阮翁仲。此人相传身高1丈3尺，秦时一尺约为23.1厘米，一丈为十尺，换算后可知阮翁仲的身高接近3米。

由于他身高惊人，勇武无双，秦始皇曾令阮翁仲守在临洮关，匈奴人没有一个不怕这员虎将的。翁仲死后，秦始皇在咸阳宫司马门外雕刻了翁仲铜像。匈奴人进犯咸阳时，大老远就被高大的铜像所恫吓，以为是阮翁仲真人，心惊胆战，不敢靠近。

自此之后，历朝帝王以及王公贵族死后，都会在陵墓前铸造身高丈余的铜人或石人像，无论石像是文官还是武将，统一都叫翁仲。

这些镇守陵墓的翁仲，重要作用之一就是震慑人心。然而，三门县博物馆这一对武将石像让人驻足不前的原因，却是一种阳刚潇洒之美。

两尊翁仲的高度都是3米，宽0.9米，头戴冠冕，身披铠甲，双手按剑，肃穆而立。由于石像位于屏风墙后，转过屏风，参观者看到石像的第一眼是侧面视角，两位武将自肩到腰呈现的柔和弧线，极为迷人。

如此曼妙的身材，与人们固定印象中武将的魁梧身姿截然不同。

可以说，这两尊石像美得很“南宋”。有宋一代，遑论北、南，重文轻武之风都没变过。南宋军队的武力值比之北宋更加低下，而举国上下的文艺水平、审美境界越来越高。

两尊武将翁仲的造像水平，彰显出典型的南宋石像造像风格。

石像的头冠、盔甲、宝剑等一套装备，雄壮威武，细节出众。无论是耳畔那一对皮制的“凤翅护耳”，还是铠甲上的鳞片、丝绦，手中那柄龙头吞口宝剑，都极为逼真。仔细看

武将的表情，并非怒目而视，而是嘴角微扬，气质极为儒雅。无论你视线停留在石像的哪个部位，都有足够的细节供品味。

如此细腻而精湛的雕工，极为流畅的线条，让人不禁怀疑：“这是用石头雕出来的吗？”

三门县博物馆馆长吴元俊解惑道：“除了南宋匠人们精湛的工艺水平，石材也是实现雕刻细腻度的重要原因。两尊翁仲采用的是产自宁波的梅园石，这种石材为宁波当地特有，石质细腻、色泽素雅，尤其是硬度非常适中，简言之，就是可塑性极强。”

只有高阶官员的坟墓前可以设立翁仲。翁仲造像还有一个秘密，体现的是墓主人身前的官位，那就是翁仲头盔的盔缨。盔缨越高，官衔越高。

三门县博物馆这一对翁仲的头盔盔缨，高高隆起，传递出一个信息：墓主人叶梦鼎，位极人臣。

据《石城广润寺中兴记》和海游《章氏宗谱》记载，叶梦鼎的墓在三门广润寺旁，广润寺就位于现在的三门中学校园内。这两尊武将翁仲是叶梦鼎唯一得以保留下来的翁仲。吴元俊说，按照叶梦鼎的官职，他的墓前原本还有石羊、石马等，可惜都未能留存。因此，两尊翁仲能够保存，实属不易。

陀螺人生

叶梦鼎的一生，可读性极强。

南宋时，宁海县属台州府管辖。叶梦鼎出生于宁海，从政生涯的最高官衔是右丞相兼枢密使。他在世的80年，正是南宋风雨飘摇的最后时光。在如此乱世当宰相，人生想没故事都很难。

叶梦鼎六岁以前有另一个名字，叫陈吉甫。

庆元六年(1200)，陈吉甫出生于宁海西岙村(今宁海县长街镇西岙村)。陈吉甫的父亲叫陈待聘，他的母亲叶氏是宁海东仓上宅人(今宁海县胡陈乡上宅村)。

叶氏的兄长叶日宣膝下无子，想到日后自己没有子孙延续香火，便向妹夫、妹妹提出希望把陈家的第三子陈吉甫过继给他。

陈吉甫六岁时正式认舅为父，改姓叶，名梦鼎。

叶家的祖上是唐代吏部尚书叶温裕，从“梦鼎”两个沉甸甸的字，可以看出叶日宣对

他寄托的厚望。

叶梦鼎也没有辜负他的名字，自读书那天起，他的抱负从未改变——为大宋奉献所有。

叶梦鼎正式出仕时已经38岁，成为正一品右丞相兼枢密使时是68岁。

这三十年，宋朝外有金元铁蹄压境的压力，内有昏君佞臣。叶梦鼎在南宋的疆土上如陀螺一样转动，是袁州、吉州、隆兴、建宁等地的知州、知府，又要回临安担任京官。

他为官造福一方的事迹很多。

淳祐七年(1247)，叶梦鼎任袁州(今江西宜春一带)知府时，得知当地的转运使向民众征收“和采”三万斛粮食，大怒，并响亮回应：“袁州山多而田少，朝廷免‘和采’已经百年，自今若一开之，百姓子孙受无穷之害，则无穷之怨从之。”(《宋史·叶梦鼎传》)。转运使们只能走人。

看到袁州百姓迷信巫医，生病不看医生只喝“神水”，叶梦鼎同样铁腕出击：废淫祠，叱巫医，填妖井，同时教百姓治病之方。

至南宋末年，他一个文官，有时不得不干起武将的活。

开庆元年(1259)，叶梦鼎转任建宁(今福建寿宁一带)知府。当时的建宁百姓眼看当良民没有活路，被迫沦为盗寇，干起刀头舔血的买卖。叶梦鼎知晓律法，更理解百姓。他下令，只捕捉为首者，不得枉杀胁从者。同一时期，眼看元兵已向江西压境，福建变成了抗元前哨。缺兵少将的叶梦鼎便在福建要害之地筑大安关，严阵以待，确保一方平安。

咸淳元年(1265)，叶梦鼎66岁，出任庆元知府兼沿江制置使，仍在修筑防御工事，缉捕海盗，造济民仓以备战时救灾，建驿舍以供战备需要……

令人意外的是，敬业爱国的他，在咸淳九年(1273)再三向度宗皇帝辞呈。小皇帝用少傅、信国公的荣誉再三挽留，叶梦鼎仍以身体多病为由，回到宁海老家。

让他坚定放弃的重要原因之一，是心灰意冷。叶梦鼎虽有“孤忠抗大奸，支持危局”的抱负，但忙碌了30年，他真的累了。

景炎元年(1276)，南宋倒数第二个皇帝赵昀是在福建即位，是为端宗。他任命早已告老还乡的叶梦鼎为太师太乙，书信呼唤叶梦鼎前往福建任职，指望这位老臣再为南宋朝廷出一力。年已76岁的叶梦鼎毅然前往，却因为水路不通，无法前行。苍老的叶梦鼎，朝着南方跪拜在地，失声痛哭。

这个忙了一辈子的老人，拖着病体回到宁海上宅村。祥兴二年(1279)，叶梦鼎在悲苦中去世。这一年，当初呼唤老丞相前往福州支援的端宗已经去世，端宗两岁的弟弟赵昀继位，是为怀宗。这个幼童在大臣们的保护中，于广东新会崖门(今江门市新会区)参加了和元军的最后一战“崖门海战”。战败之后，陆秀夫抱着赵昀，投海自尽。南宋灭亡。

生在南宋，让叶梦鼎奋力求索的一生，如一场悲凉之梦。

(参考文献:《宋史·叶梦鼎传》、《南宋丞相叶梦鼎》/薛家柱、《家国文化:叶梦鼎墓石翁仲》/望海茶 董名杰)



明龙泉窑青釉
露胎方形瓷花插



翁仲石人

扫一扫
看望潮APP